

语言类型学视域下中国日语学习者的关系从句产出研究¹

王 維宇²

蘇 鷹³

DOI: 10.18999/stul.37.113

摘要 NPAH 假说是具有普适性的类型学理论, 在欧洲的语言关系从句习得研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然而在日语关系从句中, NPAH 假说的预测力十分有限。本文通过语料库数据, 对中水平中国日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产出的关系从句进行了分析, 并综合讨论了语用(语境)因素和语义(中心名词生命性)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 语用因素是影响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关系从句的首要因素, 其次是语义因素, 最后是学习者和母语者的差异。该结论为 NPAH 假说预测力不足的原因做出了解释, 支持日语关系从句应定位为定语从句的观点, 并发现语用因素的影响大于语义因素, 且学习者采取和母语者相似的策略产出日语关系从句。

关键词 日语关系从句 中国日语学习者 NPAH 假说 语用 语义

1. 引言

关系从句(relation clauses)是现代语言学研究中广受关注的课题。国内外对各语言关系从句的研究一直十分重视, 其中日语关系从句因其独特的性质备受注目。从语言习得角度对日语关系从句进行的研究可有效的揭示学习者的语言学习规律, 明确其加工与产出策略。这类研究中很大一部分探究二语学习者如何加工或产出日语关系从句(Kanno, 2000; 2001; 2007; Ozeki & Shirai, 2007; 2009; Nishikawa, 2014; Mansbridge & Tamaoka, 2019; 坂本・窪田, 2000; 大関, 2008)。

本文将比较 JFL (Japa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中国日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产

¹ English Title: A Study of Japanese Relative Clauses Produced by Chinese JFL (Japa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Learn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² Author: WANG, Weiyu (Master Student, Hunan University, China) jwwjwwj123@gmail.com

³ SU, Ying (Professor, Shanghai University, China) sutaka@163.com

出日语关系从句的特征,并探讨二者异同的影响要素。Keenan & Comrie (1977) 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基于对 50 多种语言的研究提出了“名词短语可及性层级”(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 NPAH)假说,该假说认为不同句法位置上的名词短语形成关系从句时的难易度不同,大体上以“主语(SU) > 直接宾语(DO) > 间接宾语(IO) > 旁格(OBL) > 属格(GEN) > 比较宾语(OCCMP)”的顺序由易到难。在日语中, OCCMP 通常不会关系化,除 OCCMP 以外的日语例子如下。

- (1) a. [RC 昨日来た]人 (SU)
 b. [RC (私が) 見た]映画 (DO)
 c. [RC (私が) 本をあげた]友だち (IO)
 d. [RC (私が) 住んでいる]家 (OBL)
 e. [RC (奥さんが) 事故にあった]人 (GEN)

(例句均引自大関, 2008: 21)

自 NPAH 假说提出的 30 多年来,该假说一直是关系从句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话题,影响深远,为各种语言的习得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然而, NPAH 假说虽在英语(张, 2007; 李, 2015)、意大利语(Croteau, 1995)、法语(Mitchell, 2001)等欧洲语言的习得研究中得到验证,却在日语等亚洲语言中结论不一(张, 2011)。本文在语言类型学视域下,探讨 NPAH 假说对日语关系从句习得的适用性问题。

2. 先行研究

2.1 日语关系从句的特征

日语关系从句在形态上具有两个独特的特征:一是关系从句和中心名词的线性位置关系为“关系从句 + 中心名词”,与汉语相同但不同于英文的“中心名词 + 关系从句”;二是关系从句和中心名词之间没有关系从句标记(relativizer, 亦称为“关系化标记”),而“英语语法系统一般把 that、which、where 等关系词视为关系从句标记,汉语语法系统一般把‘的’这个结构助词视为关系从句标记”(钟、胡, 2021)。此外,在关系化策略(relativization strategy)上,学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日语关系从句的关系化策略主要是“空缺型(gap)”,涉及论元提取且存在空位(gap)和填充语(filler)的依存关系,这与汉语相同但不同于英文的“关系代词型(relative-pronoun)”(张, 2020);

另一种观点认为包括日语和汉语在内的亚洲语言的关系从句应视为定语从句，其“修饰名词的从句结构只是把修饰从句依附到中心名词上”（Comrie, 2002），本文将这种关系化策略命名为“名词修饰型”。总的来说，先行研究认为汉语与日语或为空缺型，或名词修饰型，而英语为关系代词型。基于此，笔者总结如下：

表 1 日语关系从句的特征（与汉语、英语相比较）

语言	形态特征		关系化策略
	线性位置关系	有无从句标记	
日 语 SOV	关系从句 + 中心名词	无	空缺型/名词修饰型
中 文 SVO	关系从句 + 中心名词	有	空缺型/名词修饰型
英 文 SVO	中心名词 + 关系从句	有	关系代词型

但上述表 1 中的关系化策略的提出，是仅从语法角度分析的结果，而没有考虑语用及语义等因素，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

2.2 日语关系从句的习得及影响因素

大多数对日语关系从句进行的二语习得研究大多以 NPAH 假说为理论基础，且主要围绕 SU 关系从句和 DO 关系从句的差异展开讨论。比如 Kanno (2000)、(2001) 从加工层面进行了研究。Kanno (2000) 对 3 组不同水平的 94 名学习日语的英语母语者和 4 名日语母语者进行实验，结果显示 SU 关系从句的加工难度低于 DO 关系从句。第二年，Kanno (2001) 收集了 21 名英语母语日语学习者反应时数据，同样得出 SU 关系从句的加工快于 DO 关系从句。坂本·窪田 (2000) 则是看学习者产出关系从句的情况，其对汉语、英语和马来西亚语母语者产出的日语作文统计显示，SU 关系从句的产出大于 DO 关系从句。而大関 (2008) 对日语名词修饰从句（包括关系从句）的习得进行了详细论述。其对多语种、多水平、多种语料进行了调查，纵向语料的研究结果显示，各阶段学习者产出各种关系从句并无明确偏好；横向语料的研究结果显示，高水平学习者产出 SU 关系从句的频率会高于低水平学习者，不符合 NPAH 假说（大関, 2008: 242）。可见，就 SU 关系从句和 DO 关系从句是否像 NPAH 假说预测的那样，先行研究结论不一。

此外，Comrie (1998, 2002) 认为，东亚语言不仅受句法因素制约，也受到语用和语

义层面的影响。在语义层面，许多学者指出中心名词生命性对关系从句的习得有重要作用（Kanno 2007; Ozeki & Shirai 2007; 大関, 2008）。根据语言类型学的研究，自然语言中主语通常是有生命的而宾语通常是无生命的（Du Bois, 1987）。对于日语关系从句，大関（2008: 242）也指出学习者产出日语关系从句的中心名词生命性和从句类型（SU 还是 DO）有关，SU 关系从句中的有生命名词多于无生命名词，而 DO 关系从句与其相反。在语用层面，大多数研究关注语境，有学者意识到无语境情况下，东亚语言的关系从句具有结构歧义，存在花园小径（garden path）效应，所以进行研究时需要考虑到语境因素。比如 Gibson & Wu（2013）和吴、盛（2016）就强调了汉语关系从句加工时语境的重要性；Mansbridge & Tamaoka（2019）认为有必要改变句子的语境以观察关系从句加工的细微变化，并通过对母语者的眼动实验指出结构歧义会影响日语关系从句的理解。上述研究无不显示出关系从句的结构歧义消解对语用因素的依赖性，特别是在特定语境条件下。

可见，日语关系从句的习得可能同时受语义（中心名词生命性）、语用（语境）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 NPAH 假说的预测能力有限。但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从日语学习者的产出数据上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3. 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鉴于前人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结论，且未对语义及语用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讨论，本文使用学习者语料库数据中中国日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产出的关系从句，统计各类关系从句的产出频率，并基于决策树分析方法考察语义（中心名词生命性）及语用（语境）因素的影响。

3.2 研究工具

为了使用多种语境下产出的数据，以研究语用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使用的语料数据来源于「多言語母語の日本語学習者横断コーパス(I-JAS)」(迫田, 2020)，该语料库的特点之一是产出任务具有多样性，且包含了各国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的语料，人们可以在不同任务中比较学习者和母语者使用某语言特征的特点。本文采用了语料库的两个“口述故事（ST）”及“笔述故事（SW）”语料。任务由多幅图片构成的两组漫画场景：语境 1、语境 2（见图 1，引自迫田等，2016: 99），漫画标注了标题、场景中的登场人物姓名和关

键物品名称，首先要求被试口头描述这两个漫画场景的故事内容。大约 40 至 50 分钟后（期间被试也会被要求完成其他任务），被试需要对图 1 所示两种漫画场景进行笔述。总的来说，纳入本文调查的任务共有四项（2 口述故事×2 笔述故事），即 ST1、ST2、SW1、SW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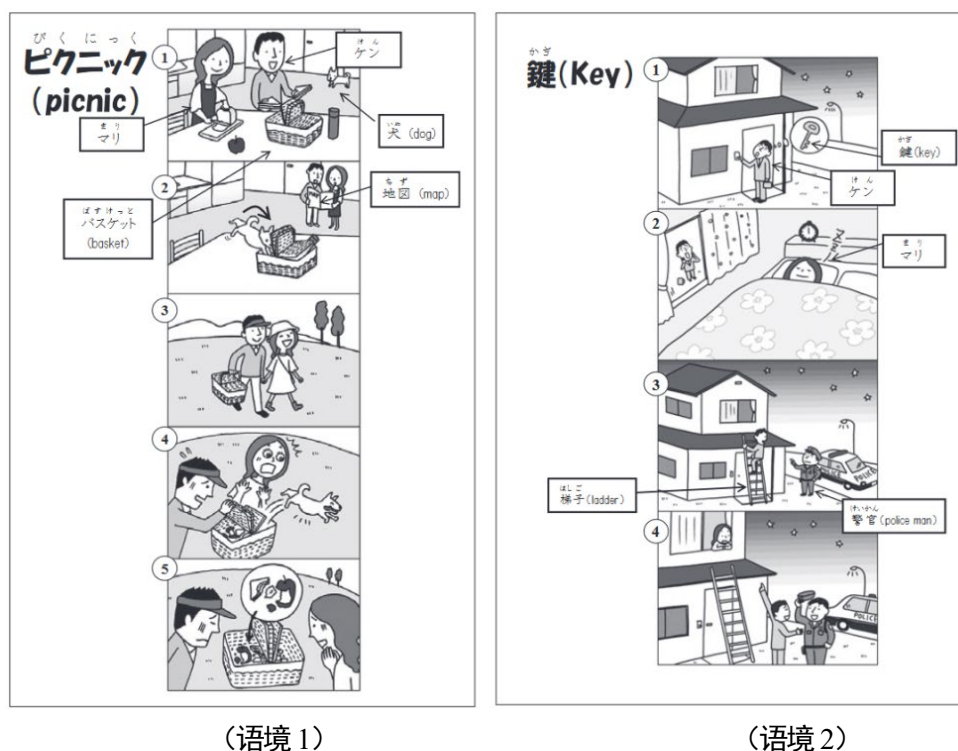


图 1 产出任务中使用的图片（引自迫田等，2016: 99）

此外，I-JAS 语料库中的每位学习者均接受了 J-CAT 和 SPOT 两种日语水平测试，J-CAT（Japanes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测试了学习者听力、词汇、语法、阅读理解四个层面的能力（今井等，2010；今井等，2012），SPOT（Simple Performance-Oriented Test）测试了学习者运用日语的综合能力（小林等，1996）。为了控制学习者日语水平，我们根据 J-CAT 和 SPOT 官网的分级信息，将 J-CAT 测试总得分为 200-299 分（中级前半至中级后半）且 SPOT 测试得分为 56-80 分（中级）的 50 名中水平中国日语学习者学习者选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⁴。这 50 名中水平学习者的 J-CAT 测试得分最低分为 207 分，最高分为 288 分，平均 229.58 分，标准差为 39.13 分；SPOT 测试得分最低分为 63，最

⁴ J-CAT 分级标准参考官网 <https://www.j-cat2.org/html/ja/pages/interpret.html>，引用日期 2023 年 11 月；SPOT 测试分级标准参考官网 <https://tbj.cegloc.tsukuba.ac.jp/p1.html>，引用日期 2023 年 11 月。

高分为 80 分，平均 73.87 分，标准差为 6.64 分。根据背景调查结果，这 50 名中水平学习者均为大学生，包括 9 名男性和 41 名女性；学习者最小年龄为 18 岁，最大年龄为 24 岁，平均 20.69 岁，年龄标准差为 1.19 岁。此外，该语料库中也包含 50 名日语母语者的数据，本文也将其纳为研究对象，以便比较母语者和学习者的异同。

3.3 数据收集及分析

被试产出的原始语料被公开在 I-JAS 语料库网站上。我们下载了所有语料，并人工对产出的关系从句进行标注。考虑到两种任务在口语和书面语条件下产出的文本大小不同，我们按照“调整频率 = (粗频率 ÷ 除标点符号外的总词数) × 100,000”的公式进行频率调整，调整后的频率表示每 100,000 字文本中关系从句的数量。表 2 提供了学习者和母语者在四种任务中产出各类关系从句及中心名词生命性的描述统计结果。由于被试均未产出 IO 关系从句，表 2 将关系从句类型分 SU、DO、OBL、GEN 四类描述。

由于涉及多项变量，本文参照玉岡（2023）的决策树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决策树分析可以对于某个目标（目标变量），用多个背景因素（解释变量）进行解释，抑或用于掌握背景因素的组成。其结果用树形图表示，可视化程度高，在语言学研究中是非常实用的统计分析方法（玉岡，2023: 1）。根据研究目的，我们将“关系从句类型”设为目标变量，将“任务类型”、“中心名词生命性”及“被试类型”设为解释变量。决策树分析中，我们仅对从句中的 SU 和 DO 两类进行分析，设为“关系从句类型”变量的两个水平，一是因为大多数的先行研究仅关注 SU 和 DO 两类关系从句，有充足的数据支持；二是因为产出的 SU 关系从句占比 54.9%，DO 关系从句占比 28.3%，而 OBL 和 GEN 关系从句产出数量很少，仅占总频率的 16.8%，且很多情况下频率为 0，得到的结果可信度不高。因此，我们将基于图 2 所示的预测模型实施分类树分析，在解释变量中，语用因素为“任务类型”，语义因素为“中心名词生命性”，同时引入“被试类型”的变量以比较学习者和母语者的差异。分析使用的软件为 SPSS 的 29 版本。在按照调整频率进行个案加权后，基于图 2 所示的预测模型，我们将“关系从句类型”设为因变量，将“任务类型”“中心名词生命性”及“被试类型”设为自变量。树形图生长法为 CHAID 法，拆分节点和合并类型均为默认的 5%显著性水平（0.05），最大树深度为 3 层，最小父节点数为 100，最小子节点数为 50。同时，我们没有勾选“强制第一个变量”命令，此时输出的树形图结果将按照各影响因素（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进行分支。

表2 学习者和母语者在四种任务中产出关系从句类型及中心名词生命性的描述统计

被试类型	任务类型	生命性	关系从句类型				总计	关系从句类型 (调整后)				总计	
			SU	DO	OBL	GEN		SU	DO	OBL	GEN		
中国日语学习者	ST1	有生	1	4	0	0	5	14	56	0	0	70	
		无生	3	7	3	2	15	42	98	42	28	210	
	ST2	有生	11	0	0	0	11	142	0	0	0	142	
		无生	1	0	2	0	3	13	0	26	0	39	
	SW1	有生	6	3	0	0	9	129	65	0	0	194	
		无生	9	12	7	0	28	194	259	151	0	604	
	SW2	有生	23	0	2	0	25	472	0	41	0	513	
		无生	2	0	1	0	3	41	0	21	0	62	
	日语母语者	ST1	有生	15	16	0	0	31	257	274	0	0	531
			无生	6	31	9	6	52	103	531	154	103	891
		ST2	有生	31	0	0	0	31	495	0	0	0	495
			无生	14	0	3	0	17	223	0	48	0	271
SW1		有生	6	11	0	0	17	303	223	0	0	526	
		无生	3	26	22	3	54	142	526	445	61	1,174	
SW2		有生	60	0	0	1	61	1,071	0	0	18	1,089	
		无生	17	0	2	2	21	303	0	36	36	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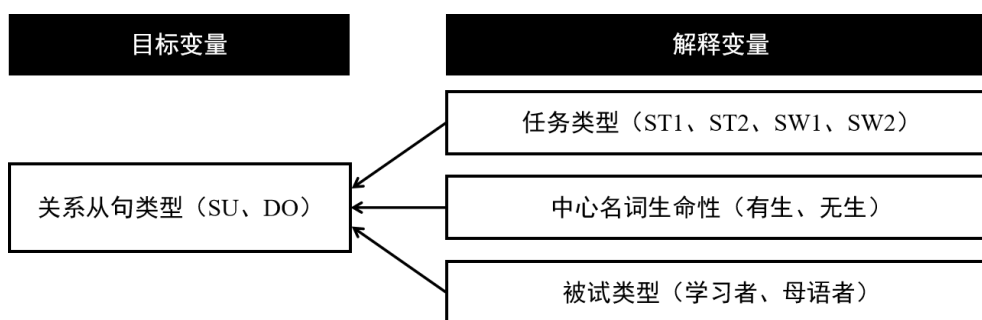


图2 决策树分析的预测模型

4. 研究结果

我们基于 SPSS 输出的树形图结果重绘得到图 3。重绘的目的是便于排版和美观，没有对数据进行改变。通过重绘，我们对每层的节点按照 SU 关系从句占比由小至大的顺序从左到右排列，并用灰色的底色突出每个节点中占比更高的关系从句类型。该树形图的风险估算值为 0.17，表示大约有 83% 的数据被正确分类，远高于基准分类准确率（总是选择频率占比更高的关系从句类型，即 66.0%），是预测能力很强的模型。如图 3 所示，树形图的深度为 3 层，共有 15 个节点。树形图最上方的节点 0 是根节点，显示了产出关系从句类型的总体分布情况：SU 关系从句占比 66.0%，高于 DO 关系从句的 34.0%（节点 0）。

首先，树形图根据“任务类型”的不同进行延伸，分支出有显著性差异的 3 个子节点 [$\chi^2(3)=2688.43, p<.001$]，分别为 ST1、SW1 和 ST2; SW2。ST1 的情况下，SU 关系从句的产出占比为 30.3%，低于 DO 关系从句（节点 1）；SW1 的情况下，SU 关系从句的产出占比为 41.7%，显著高于 ST1 的占比，但仍然低于 DO 关系从句（节点 2）。而 ST2 和 SW2 被合并在一个节点中，其 SU 关系从句占比 100%，没有观察到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 DO 关系从句（节点 3）。

其次，在节点 1 和节点 2 下方，树形图根据“中心名词生命性”进一步分支，说明学习者和母语者在 ST1 和 SW1 的任务条件下产出的关系从句类型会显著受到中心名词生命性的影响 [$ST1: \chi^2(1)=111.38, p<.001$; $SW1: \chi^2(1)=162.57, p<.001$]。在 ST1 任务条件下，当中心名词生命性为无生时，SU 关系从句占比 18.7%，低于 DO 关系从句的 81.3%（节点 4）；当中心名词为有生时，SU 关系从句占比 45.1%，显著高于无生情况的占比，但依然低于 DO 关系从句的 54.9%（节点 5）。在 SW1 任务条件下，当中心名词为无生时，SU 关系从句占比 30.0%，低于 DO 关系从句的 70.0%（节点 6）；而当中心名词为有生时，SU 关系从句占比显著提高，达到 60.0%，超过 DO 关系从句 40.0% 的占比（节点 7）。在节点 3 所示的 ST2 和 SW2 任务条件下，没有显示出中心名词生命性的差异，即在标题为「鍵」的产出任务中，中心名词的生命性不会影响被试产出关系从句的类型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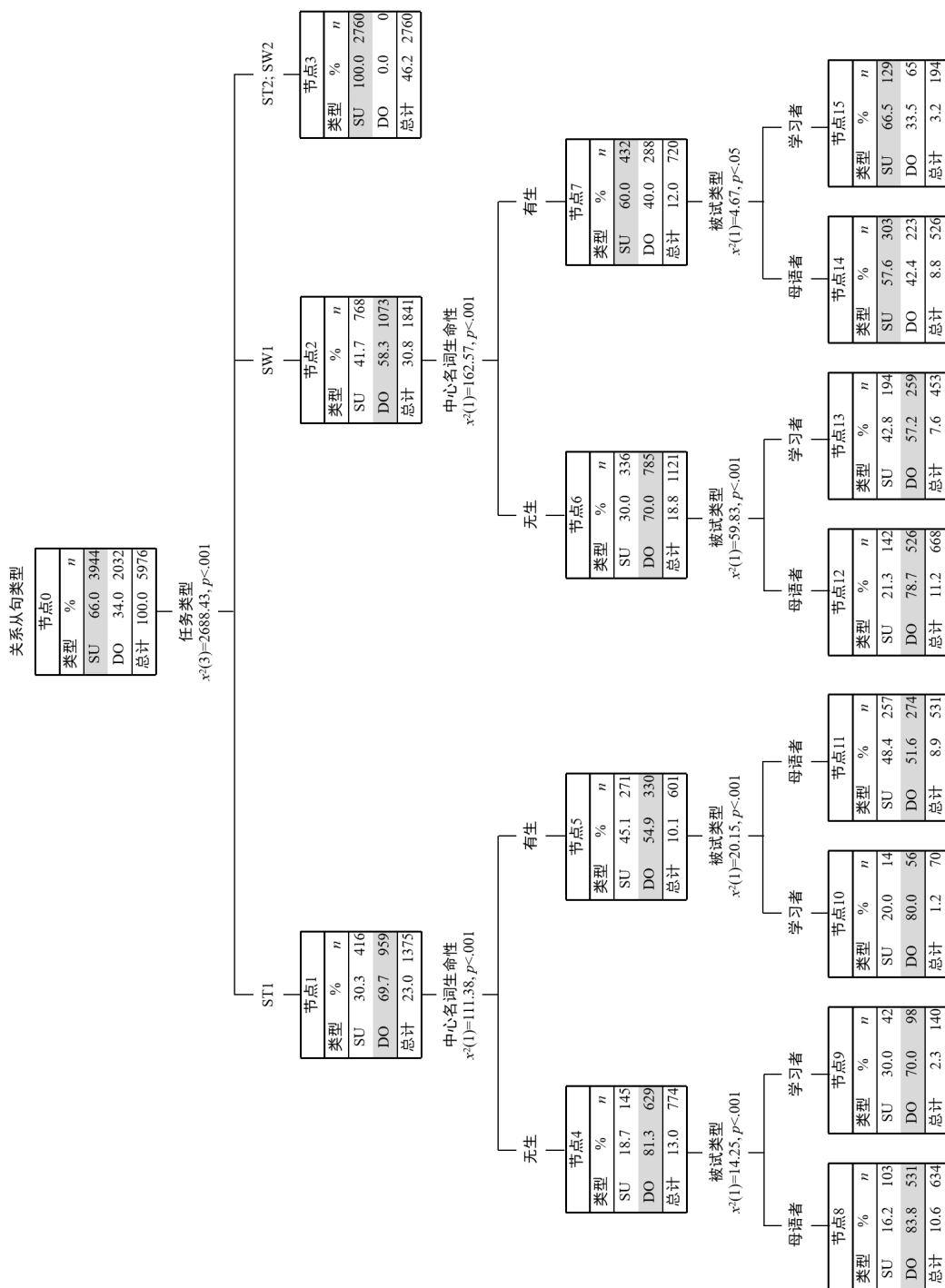


图3 使用决策树分析预测关系从句类型的树形图结果

最后，在节点4、节点5、节点6和节点7的下方，树形图进一步按照“被试类型”进行分支，表明在ST1和SW1任务的无生和有生中心名词条件下，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的关系从句类型占比均具有显著性差异[ST1 无生: $\chi^2(1)=14.25, p<.001$; ST1 有生: $\chi^2(1)=20.15, p<.001$; SW1 无生: $\chi^2(1)=59.83, p<.001$; SW1 有生: $\chi^2(1)=4.67, p<.05$]。在任务

类型为 ST1 且中心名词为无生的条件下, 母语者产出的 SU 关系从句占比 16.2%, 低于 DO 关系从句的 83.8% (节点 8); 学习者产出的 SU 关系从句占比显著高于母语者, 达到 30.0%, 但依然低于 DO 关系从句的 70.0% (节点 9)。在任务类型为 ST1 且中心名词生命性为有生的条件下, 学习者产出 SU 关系从句的占比为 20.0%, 高于 DO 关系从句的 80.0% (节点 10); 而母语者产出的 SU 关系从句占比显著高于学习者, 达到 48.4% (节点 11)。在任务类型为 SW1 且中心名词生命性为无生的条件下, 母语者产出的 SU 关系从句占比 21.3%, 低于 DO 关系从句的 78.7% (节点 12); 学习者产出 SU 关系从句的占比显著高于母语者, 达到 42.8%, 但仍然是 DO 关系从句占比更高 (节点 13)。在任务类型为 SW1 且中心名词生命性为有生的条件下, 母语者产出的 SU 关系从句占比 57.6%, 高于 DO 关系从句的 42.4% (节点 14); 学习者产出 SU 关系从句的占比显著高于母语者, 达到 66.5% (节点 15)。在节点 3 所示的 ST2 和 SW2 任务条件下, 没有显示出被试类型的差异, 即在标题为「鍵」的产出任务中, 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关系从句的类型相同, 均只产出 SU 关系从句。

5. 综合讨论

决策树分析的结果显示, “任务类型”、“中心名词生命性”和“被试类型”均对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 SU 和 DO 关系从句的频率有显著性影响。“任务类型”是首要影响因素, 其次是“中心名词生命性”, 最后是“被试类型”。“中心名词生命性”和“被试类型”仅在标题为「ピクニック」的产出任务下显示出显著性差异。如果不考虑任何因素的影响, 仅看总体的占比分布, 则 $SU > DO$, 符合 Keenan & Comrie (1977) 的 NPAH 假说的预测结果。然而, 不同任务类型下的关系从句类型分布有较大差异。任务类型包括两幅主题不同的连环画图片提供的两种不同语境, 每种语境又根据产出方式进一步分为口述故事 (ST) 和笔述故事 (SW)。从图 3 看, 比起产出方式, 语境的差异的确更明显。在标题为「ピクニック」的语境 1 下, 尽管被试在口述故事 (ST1) 产出和笔述故事 (SW1) 产出的关系从句在类型占比上差异显著, 但 SW1 的 SU 关系从句占比仅比 ST1 高出 11.4%, 且没有改变 SU 关系从句占少数的事实, 均不符合 NPAH 假说。然而, 在标题为「鍵」的语境 2 下, 口述故事 (ST2) 和笔述故事 (SW2) 产出的关系从句类型分布并无差异, SU 关系从句占 100%, 均未观察到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 DO 关系从句, 符合 NPAH 假说。可见, 语用因素正如 Mansbridge & Tamaoka (2019) 所提及的那样, 是影响日语关系从句习得的一大因素。

其次,关系从句类型占比分布受中心名词生命性这种语义因素影响。在 ST1 和 SW1 条件下,当中心名词为无生时,比起有生的中心名词,DO 关系从句的占比显著提高;在 ST2 和 SW2 条件下,由于被试只产出了 SU 关系从句,中心名词生命性不会影响 SU 关系从句占比,但描述统计的结果显示,SU 关系从句搭配的中心名词中,有生的中心名词占比 78.9%,远超无生的中心名词。大関(2008)的结果显示,汉语和英语母语的日语学习者产出的关系从句中,SU 关系从句倾向于修饰有生中心名词,DO 关系从句倾向于无生中心名词,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这种倾向性。但就关系从句类型的占比情况来看,ST1 任务下,无生中心名词更倾向于搭配 DO 关系从句,而有生中心名词更倾向于 SU 关系从句;SW2 任务下,无生和有生中心名词均更倾向于搭配 DO 关系从句;ST2 和 SW2 任务下,无生和有生中心名词都只被 SU 关系从句修饰,中心名词生命性不影响关系从句类型分布。这种不一致性表明,尽管中心名词生命性影响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的关系从句类型分布,但受到语用因素影响,导致各任务下的结果不一。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 Comrie(1998; 2002)提出的观点,即日语关系从句应被视为定语从句,因为关系从句中的空位和中心名词的空位-填充依赖关系并不强,反而更容易受到语用和语义因素的影响。其关系化策略也应该是相应的“名词修饰型”而不是“空缺型”。且研究结果显示语用因素的影响大于语义因素。

最后,“被试类型”在 ST1 和 SW1 的有生和无生中心名词的条件下分别显示出显著性影响,但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的关系从句类型分布在每个条件下均显示出相同的产出倾向,且在标题为「鍵」的语境 2 的条件下,学习者和母语者均只会产出 SU 关系从句,被试类型不影响关系从句类型分布。学习者和母语者产出的关系从句类型占比分布相似,我们推测这或许是因为汉语和日语同为东亚语言,关系从句的形态均为“关系从句 + 中心名词”形式,这种形态相似性致使学习者将母语知识迁移到二语中,采用和母语者相同或相似的方式产出日语关系从句。

在关于日语关系从句习得的先行研究中,一部分支持 NPAH 假说的预测(Kanno, 2000; 2001; 坂本·窪田, 2000 等),一部分不支持(大関, 2008 等),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将语用和语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导致结果各异。不过,这也说明 NPAH 假说对日语关系从句的预测力有限,会受到语用和语义因素的制约。总的来说,学习者和母语者会依据语用(语境)和语义(中心名词的生命性)条件有选择地使用关系从句,导致关系从句的类型占比显示出差异。

6. 结语

本文利用 I-JAS 语料库中 50 名中水平中国日语学习者和 50 名日语母语者在两种语境下的“口述故事”和“笔述故事”产出任务中产出的关系从句语料，通过决策树分析的方法，以关系从句类型（SU 和 DO 关系从句）为目标变量，以“任务类型”、“中心名词生命性”及“被试类型”为解释变量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SU 和 DO 关系从句的产出受语用（语境）因素影响最大，其次是语义（中心名词生命性）因素，最后是学习者和母语者的差异。在日语关系从句中，NPAH 假说的预测力十分有限，只有部分情况符合 NPAH 假说的预测。这说明，日语关系从句不太依赖空位与填充语的依存关系，不太受句法条件的制约，而更容易受语用与语义因素的影响。这也支持了 Comrie (1998; 2002) 的观点，即日语关系从句的定位是定语从句。因此，人们会采用“名词修饰型”而不是“空缺型”的关系化策略进行关系从句的构建。由此看来，虽然 NPAH 假说是基于 50 多种语言提出的类型学共性，然而在日语中，NPAH 的普适性值得进一步推敲，理论需要进一步细化。

本研究的结论为日语关系从句的定位、关系化策略、及影响因素提供了支持。然而，本次研究受篇幅限制，仅比较了中级水平中国日语学习者与日语母语者的差异。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分学习者日语能力水平，考察其他语种的日语学习者关系从句的产出情况。倘若语用和语义因素的影响是跨语言的，那么多种母语的学习者均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得出的结果会与本研究的结果相似。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本文系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历时作文语料的日语学习者并列复句动态发展研究》（立项时间：2020 年 12 月，主持人：苏鹰，项目编号：20YBA05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今井新悟・赤木彌生・中園博美(2012)『J-CAT オフィシャルガイド:コンピュータによる自動採点日本語テスト』東京:ココ出版。
- 今井新悟・伊東祐郎・中村洋一・菊地賢一・赤木彌生・中園博美・本田明子(2010)『J-CAT Japanese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 日本語能力をコンピュータで測る』山口:山口大学留学生センター。
- 大関浩美(2008)『第一・第二言語における日本語名詞修飾節の習得過程』東京:くろしお出

版.

- 小林典子・フォード丹羽順子・山元啓史(1996)「日本語能力の新しい測定法「SPOT」」「世界の日本語教育」6, 201-218.
- 坂本正・窪田彩子(2000)「日本語の関係節の習得について」『南山大学国際教育センター紀要』1:114-126.
- 迫田久美子・小西円・佐々木藍子・須賀和香子・細井陽子(2016)「〈共同研究プロジェクト紹介〉基幹型:多文化共生社会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研究 多言語母語の日本語学習者横断コーパス」『国語研プロジェクトレビュー』6(3):93-110.
- 迫田久美子(2020)「I-JAS 誕生の経緯」迫田久美子・石川慎一郎・李在鎬(編)『日本語学習者コーパス I-JAS 入門:研究・教育にどう使うか』:2-13. 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 玉岡賀津雄(2023)『言語研究による決定木分析』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 李金满(2015)《类型学视阈下的英语二语关系从句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吴芸芸、盛亚南(2016)〈试论语境条件下限定词的必要性——再谈主语关系从句的加工优势〉《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39(2): 11-20.
- 张静苑(2020)〈汉日关系从句的名词短语可及性对比研究〉《日语学习与研究》5: 22-32.
- 张铭润(2007)《英语学习者的中介语句法特征》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张铭润(2011)〈名词短语可及性层级与关系从句二语习得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4(2): 37-43; 127.
- 钟琳、胡深爱(2021)〈汉英关系从句儿童语言习得的语料库对比研究〉《现代外语》44(2): 208-220.
- Comrie, B. (1998). Attributive clauses in Asian languages: Towards an areal typology. *Sprache in Raum und Zeit: In memoriam Johannes Bechert*, 2, 51-60. W. Boeder, C. Schroeder, K. H. Wagner & W. Wildgen. *Sprache in Raum und Zeit: In memoriam Johannes Bechert, Band 2*. Tübingen: Gunter Narr, 51-60.
- Comrie, B. (2002). Typolog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 case of relative clauses. A. G. Ramat. *Typ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37.
- Croteau, K. C. (1995)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by learners of Italian. F. R. Eckman, D. Highland, P. W. Lee, J. Mileham & R. R. Weber.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and Pedagogy*. Mahwah, NJ: Erlbaum: 115-128.
- Du Bois, J. (1987). The Discourse Basis of Ergativity. *Language*, 63, 805-855.

- Gibson, E. & Wu, H.-H. I. (2013). Processing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in context.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28(1-2), 125-155.
- Kanno K. (2000). Sentence processing by JSL learners. *Paper for SLRF 2000*, Madison: WI.
- Kanno, K. (2001). On-line processing of Japanese by English L2 learners.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4, 23-38.
- Kanno, K. (2007). Factors Affecting the Processing of Japanese Relative Clauses by L2 Learner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9(2), 197-218.
- Keenan, E. L. & Comrie, B. (1977).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 *Linguistic Inquiry*, 8(1), 63-99.
- Mansbridge, M. P. & Tamaoka, K. (2019). Ambiguity in Japanese Relative Clause Processing. *Journal of Japanese Linguistics*, 35(1), 75-136.
- Mitchell, J. G. (2001) *Th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 Structures in French as a Second Language*. Ph. D. dissertation. Cornell University.
- Nishikawa, T. (2014). Nonnativeness in Near-native Child L2 Starters of Japanese: Age and th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Applied Linguistics*, 35(4), 504-529.
- Ozeki, H. & Shirai, Y. (2007). Does the 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Hierarchy Predict the Difficulty Order in the Acquisition of Japanese Relative Clauses?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9(2), 169-196.
- Ozeki, H., & Shirai, Y. (2009). Semantic bias in the acqui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in Japanese.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37, 197-215.